

我的父母是上海人，父親任職於陳納德在上海所成立的中國航空公司（簡稱中航）。1949年底，中航隨同政府搬遷來臺，父母也因公司搬遷而搭乘逃難船來到臺灣，輪船於基隆港靠岸。後來，中航為了支援臺南機場的機械維修，因而在臺南復工，公司為了安頓員工的住所，當時在臺南市新町租賃一批房屋做為員工宿舍。父親是中航員工，因而得以在公司的安排下入住宿舍，其位置大約是在今日臺南的大智街，當時的我才幾個月大。

我有兩個生日，很特別。真正的出生日是民國38年10月28日，剛好是父母來臺之後不久，母親於臺南生下了我。在那個大動亂的年代，很多中國人根本沒有報戶口的觀念。來到臺灣，有次警察來家裡盤問我的身分時，父親抱著我反問警察：「為什麼要報戶口？」。之後，父親就去為我申報戶口，那天是民國39年2月5日，戶政人員以為我是那天出生就將當天紀錄為出生日，父親不識字，這個紀錄在戶籍資料上的登記日也就成為我的生日。

民國44年，我已經到了念小學的年紀，因為身分證登記的年齡不足，所以不能入學。後來媽媽就去找新南小學的校長表示說：「隔壁同年生的孩子都可以念書，為什麼我的孩子不可以？」，校長斟酌之後便同意我入學。

從小我在中航宿舍長大，宿舍裡都講上海話，因此求學前，我從來沒有聽過國語和臺語。結果上學後，老師講的話，我完全聽不懂。大約連續一個月，我都是背著書包去，再背回家，完全聽不懂，功課也沒做，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不久，老師就來住處找我父母，結果巧遇鄰居，就請鄰居轉述我媽媽說：「這個小孩可能是個白癡。」，媽媽聽後自我調侃說：「反正父母都不識字。」

一個月後，中國航空公司不再續租宿舍，於是給了我父母親一點錢，要我們搬走。離開宿舍，我們流浪了一段時間，後來才找到房子，我也因而轉學到公園國小，遇上我的貴人周鳳書老師。我記得很清楚，老師對我父母說：「看你們這麼忠厚老實，你們的後代不應該是個白癡！」。從此在學校，上午上課，下午我就留在周老師身邊，他個別教我ㄅ、ㄆ、ㄇ、ㄋ……，個別輔導。後來，在我獲得40年資深教師貢獻獎，到總統府受獎時，我曾特別說明周鳳書老師對我的影響，就因為他沒有放棄我，才有後來的我，造就我以後的數學教學。我認為，如果我的學生數學學不好，有可能是我沒有講清楚，學生才聽不懂，因此我會想盡方法讓學生了解。

工作的關係，我父母得輾轉租房子，也因此，小學我讀了五所，從新南國小、公園國小、南師附小、勝利國小，最後到立人國小才畢業。當時，臺灣的小學生就有補習的風氣，很多小學生除了星期天下午休息之外，其餘時間都在補習，直到晚上看不到黑板為止，惡性補習就這樣形成。還記得有一部漫畫，畫中小學生戴上厚厚的眼鏡，背著很多參考書，格外諷刺。當時，曾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向蔣中正總統說：「小學生這個樣子，將來怎麼反攻大陸呢？建議小學進入初中，應該不要考試！」。蔣中正就詢問了當時的教育部長閻振興、教育廳長潘振球，某種程度順勢推動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小學畢業，我進入延平初中就讀。一年級時，父親被中航解雇，後來透過鄰居金伯伯輾轉介紹，父親進入位於新店的裕隆工廠上班，於是全家搬遷到台北，還記得是3月29日來到新店。隔天，我來到新店文山初中想要辦轉學，校方回應說：「我們不接受轉學生」，主要原因是



當時初中都是考試考上的，跟小學可以隨意轉學是不一樣的。後來透過介紹，我轉到裕隆工廠旁的南強初中就讀。這是一所由福建人所開辦的一所私立初中，學校規模小，一個年級才一班，校長是吳本煜，其實當時的福建省政府就在裕隆工廠旁、南強初中附近。也因此，學校裡大多講福州話，雖然我已經會說臺語，可是聽不懂福州話。校方看到我二年級的成績單有四科不及格，其實是很勉強收下我，反正只剩一年時間即將畢業。父親也期望我畢業後，能進入裕隆當學徒，因為進入裕隆的基本條件是要初中畢業。上課沒幾天，數學老師要考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全部竟然只有我一人會解答，而且還用老師尚未教過的公式演算。後來，我參加臺北八省中聯招，我考上板橋中學，據說是南強初中第二個考上省中的學生。家裡認為我是讀書的料，就繼續支持我升學。

進入板橋中學後，我開始展現在數學的能力與興趣。記得一開學，數學老師教三角函數，不久就月考，全校九班、450位學生，及格者竟然不到十位，而我就是班上唯二及格者，成績有70幾分，還不錯，也是班上第一名，所以就感到很有成就感。以前家裡經濟不好，沒有錢補習，也買不起參考書，我讀書的方法，就是老師教過的，回家就做習題直到熟練，自學動力和自制力很強。一年級結束後開始選組，其實我也不清楚要選社會組還是自然組，同學聽我選社會組後，就叫我改成自然組，要跟他們一起。那個年代最火熱的學門是物理系，熱血的高中生常懷有科學救國的雄心壯志，希望有機會到美國德州休士頓太空中學發展我國的太空科學，解救大陸同胞。在民國55-57年間，物理系都是夢幻的科系。後來，我們班上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考上公立大學，我是高師大數學系，他考成大。還記得，那時候大學放榜是透過收音機播放榜單，當年戰戰兢兢聽著「放送」的情境，頗令人回味。

民國56年8月底，我來到「省立高雄師範學院」報到。坐火車來到高雄市，出火車站一眼看過去，心裡想著：「公車這麼少，都是腳踏車，好鄉下啊！」。接著，我就從火車站走路到當時的市立醫院也就是現在的大同醫院去做體檢，其實就是繳20元費用，印章蓋一蓋就完成了，當晚住我爸在鹽埕區的朋友家。隔天去學校報到，一早，沿著五福路走去，遠遠就看到二所學校，那是高雄市立第十二初級中學，就是現在的五福國中，以及省立高雄師範學院當時還有省立高雄女子師範學校二屆的學生。當時學校校園很小，周邊景觀頗荒涼，也沒有房子。校園的一側是凱旋國小(今師大附中)，而現在的體育館、游泳池那一帶，都被人佔用養雞、種花。正式上課後，穿制服、理平頭、住宿舍。男生宿舍是用教室裝修而成，每間可住40個人，床鋪是上下鋪。生活常規上，晚上9點半熄燈，早上6點起床，6點半升旗後點名掃地，7點吃早餐。每周上課五天半，只有週六下午和週日可以外出，管得很嚴。第二年，學校在今日體育館旁趕工興建一棟男生宿舍，優先給二年級生住。到了我三年級時，又新建一棟宿舍，於是又住進新宿舍，第一棟宿舍就給二年級學弟住。不過這些昔日的宿舍現已經都拆除了。

回首個人求學生涯，感謝周鳳書老師不棄教導，讓我有機會得以在學習中找到對數學的自信與樂趣。高雄師範學院是我歷經中小學不斷轉學後最重要的基礎與起點，也因此可以後來出國留學，並回到母校任教至退休，一生備感懷念。（本文作者李文環為台研所副教授）